

就是要保护好中国社会现有的公正的资源分配原则，不仅要保证汉族代表，也要保障少数民族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的公正途径的畅通。

中国是一个伟大和强大的国家，中国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对自己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包括汉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承认这种多样性的存在并支持多样性的发展是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团结起来的必要因素。

【论 文】

民族视野下的历史：从俄罗斯帝国到苏维埃国家¹

励 轩²

自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进入了民族主义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为国家建构的基本原则。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纷纷在 19 世纪有意无意地遵循这一原则，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成功构建有助于统治精英对本国民众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用于抵抗外来侵略甚至是发动对外侵略。然而，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成功转型为民族国家。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向民族国家转型中均未获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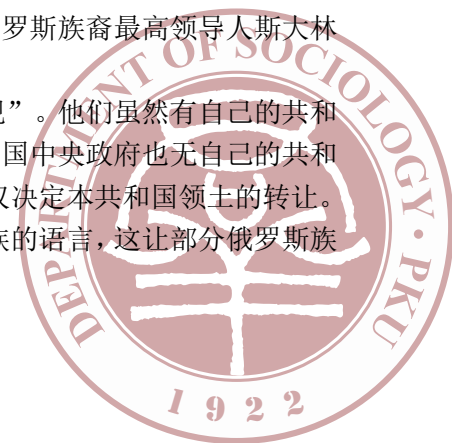
俄罗斯帝国为了应对民族主义时代带来的剧变，从 19 世纪中期起逐步调整自己的民族政策，由分而治之转变为同化政策，压制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甚至是境内穆斯林群体的语言和文化，试图构建一个民族国家。但这种同化政策加速了境内非俄罗斯裔民族对沙皇俄国政权的不满，导致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非俄罗斯裔民族的分离倾向加剧。1917 年二月革命后，沙皇退位，临时政府废除了沙皇政权所建立和实施的有助于压制非俄罗斯裔民族分离的机构和措施。部分地方的非俄罗斯裔精英迅速组织起来填补了权力真空，并在虚弱的临时政府时期和动荡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初期，掀起了分离主义浪潮，沙皇俄国留下的庞大版图瞬间瓦解。

布尔什维克政权成立后，放弃了构建民族国家的想法。党的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不仅公开主张民族自决，还设计了一整套旨在保障和鼓励非俄罗斯裔民族权利的制度，比如设置民族领地，鼓励民族语言在民族领地内的使用，提拔民族干部，支持民族文化的发展，实行联邦制，推动民族间经济平等化，短暂限制俄罗斯裔移民非俄罗斯裔民族领地。这些民族政策帮助布尔什维克政权迅速赢得了非俄罗斯裔民族政治精英的支持，促成新政权在短期内大致恢复了沙皇留下的版图。在 1920 年至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苏联众多非俄罗斯族裔享有着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都无法比拟的良好待遇。他们拥有自己的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他们的语言在自己的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是官方语言并且处于强势地位；民族干部得到空前重视，不仅在本民族领地内担任一把手和其他要职，还涌现了非俄罗斯族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大量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非俄罗斯族裔民族相比，此时的俄罗斯族裔反而受到了“歧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然而却并没有被机构化，既无自己的共和国中央政府也无自己的共和国党中央，其拥有的权力和资源远远小于其他加盟共和国，甚至无权决定本共和国领土的转让。生活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大量俄罗斯族裔公民还要被迫学习命名民族的语言，这让部分俄罗斯族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3 年 9 月 13 日第 8 版。

²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



裔公民对苏共的政策产生了不满。而对苏联来说，危害更大的则是来自民族边界的固化。自从实行苏联式肯定性行动后，族裔性对于苏联的普通公民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事，区分我族和他族并将这种区分延续下去变得极为重要。

作为苏联民族政策的设计者，斯大林似乎看到了俄罗斯族裔的不满，并试图进行修正。当世界进入上世纪 30 年代，国际局势的发展对苏联越来越不利，他越来越感到团结国内民众特别是俄罗斯族裔的必要性。在这个背景下，他于 1933 年暂停了已推行十余年的本地化政策（即在民族领地内的党政机关、国有机构重用民族干部并鼓励或要求任职的俄罗斯族裔干部学习地方文化），批评并撤换了他认为有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乌克兰党政领导层。出于备战或战争需要，他还将境内部分他所认为的亲德或亲日的民族，比如日耳曼人、朝鲜人、车臣和印古什人等，迁徙到远离边境的地区。然而这种修正虽然缓解了俄罗斯族裔的不满，却并未打破苏联的族群固化，族裔性依旧是一个事。

同时，斯大林对苏联国家体制的改革，也将非俄罗斯裔民族甚至是俄罗斯族裔的不满引向苏联的党和国家。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期，斯大林放弃了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新经济政策，代之以全面的计划经济。随之而来的还有政治权力集中化，原先设计的联邦制名存实亡。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党和政府成为了可以掌管一切事务的机构。但是恰恰这种集权模式，将各个民族的不满都引向了党中央和苏联政府。乌克兰党政领导人向联盟中央请求给与乌克兰更多的自主权力时，遭到了清洗；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党政领导人向联盟中央透露出制度化俄罗斯联邦的愿望时，也遭到了清洗。苏联境内所发生的每一起民族冲突都能找到党和政府的身影，即使他们的本意是维护民族团结与和谐，但是冲突中失败的一方并不领情，还会将党和政府视做镇压者。所有这些痛苦或自认为痛苦的经历虽然不能马上演变成民族起义，但却变成了一种记忆，在几十年后被人重新拾起。

尽管斯大林给大量俄罗斯族裔公民和非俄罗斯族裔公民都带来过痛苦，但不可否认，他所推行的肯定性行动以及之后的修正确实有助于苏联民族关系维持表面的平静。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民族矛盾在文献上并不是一个大问题。赫鲁晓夫甚至自豪地宣称苏联已经成功解决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民族问题。但这并不标明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外界并不容易知道苏联民族冲突的存在。

【时事评论】

普京的族裔难题¹

方 亮

苏联解体是俄罗斯民族主动抛弃了其他民族以及这些民族传统居住的领土。今日俄罗斯人再次表现出这种苗头，这已经与国际舆论探讨多年的“二次解体”暗合。

7 月，俄罗斯三大舆论调查机构之一“列瓦达中心”给出一份调查结果：51%的俄罗斯人不反对车臣脱离俄联邦，只有 10%认为应该使用各种手段阻止车臣独立。遥想两场车臣战争的年代，俄罗斯人对国家与本民族的认同达到苏联解体后的高峰，恐怖袭击带来的切肤之痛，以及经济困

¹ 本文刊载于《南风窗》2013 年 8 月 28 日-9 月 10 日第 18 期，总第 496 期，第 80-81 页。

